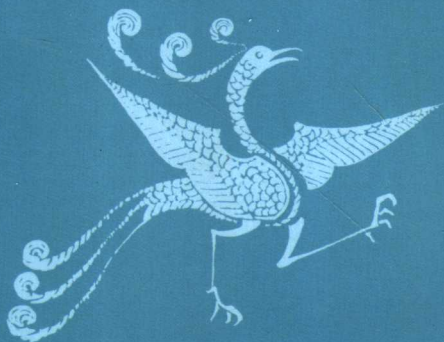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



刘
进
才
著

本书首次系统地 把语言运动、现代文学与国文教学纳入一个互动共生的文化整体加以考察,从原始资料入手,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还原晚清以来语言运动发生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阐明现代文学的语言动力机制,探讨现代汉语书面语为何以及如何建立的内在脉络,分析语言运动及现代文学在共同造就现代汉语书面语过程中所各自承担的功能,进而深入考察了国文教学这一国语运动和现代文学共享的文化场域。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

刘进才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刘进才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8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5756 - 0

I. 语… II. 刘… III. ①汉语规范化 - 研究 - 清后期
②汉字改革 - 研究 - 清后期③现代文学 - 文学语言 - 研
究 - 中国 IV .H1 - 09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8463 号

书 名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

著 者 刘进才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舒 琴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756 - 0

定 价 42.00 元

序

解志熙

中国现代文学一开步，就把文学语言的革命和建设——以白话代替文言进而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确定为其首要的现代性目标。在其后的现代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中，文学语言的变革目标更是不断拓展，自然也难免分歧和矛盾的困扰，所以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规模浩大、影响广泛的语言问题论争，如“欧化”问题，“大众语”问题，“方言文学”问题，如此等等，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文学语言的变革实际上又与现代语言学运动、语文教学改革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等等问题，构成了非常复杂的关联与互动。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语言变革既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现代性问题，又是一个关涉甚多的难题。令人感佩的是，前辈们从重重困难和困扰中一路跋涉过来，终于在新中国之初大体上完成了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历史使命。这不论从中国文学史来看还是就汉语言史而言，都是一个空前的历史性成就，其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和对民族生活的深远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然而，这样一个关系至巨、意义重大的历史事变，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未能成为“被意识到”的学术课题。虽然对单个作家的语言风格以至某一文学流派的语言特点的研究并不缺乏，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无谓的重复，但系统性的研究则即使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事实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才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是几个先得西方新近语言哲学理论的敏慧之士，他们率先开拓，陆续推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促使学界同行普遍意识到这个学术课题的重大意义，纷纷投身于研究的行列。就此而言，那几个先行的研究者的确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带头作用。不过，先行

者们总是难免偏颇，往往急于在理论上一展身手，而常常疏于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于是，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在有意无意间转换成了挑选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事例来对不需证明的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再阐释。难怪人们在看过一阵热闹之后，又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实际到底是怎么回事，仍然是个有待从头进行梳理和实事求是分析的问题。

进才的这本《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他2004年10月到2006年10月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博士后的研究成果。当然，在此之前进才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而当勤奋过人的他进入文学所后，既得到名师的指点，又得以充分利用文学所及北京丰富的文献与信息，所以短短两年间，工作进展迅速，思考日趋成熟，到去年秋季如期完成了文稿的撰写。我知道，进才并无与人攀比的心思，他也确实不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捷足先登者，但在我看来，他的这部新著无疑是一部后出转精之作，若就其多方面的学术原创性而论，也堪当真正的开拓之作。去年11月，当这部书稿作为进才的博士后研究结项成果提交答辩时，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如进才的合作导师杨义先生在评语中就感慨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趋成熟定型的今天，很多学者都苦于无题可做。该课题承担者独具慧眼地以近代以来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为论述对象，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课题的发掘探讨，有诸多人们所未发的地方。首先在史料上花费大量精力，发掘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令其论述面目一新；其次，该课题将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考察，打破了此前学界将语言运动、现代文学、语文教学三者分割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现代语言与文学生产的整体观。”张中良先生也感叹：“这一课题带有跨学科性质，对于学者来说具有挑战性，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创新性。该课题从原始资料入手，从中发现问题，把握住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密切关联的肯綮，既揭示了晚清以来语言运动的思想文化脉息，又阐明了现代文学的语言动力机制。相信该课题的完成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在目前的现代文学之语言学视角中居前沿位置。”有兴趣的读者自会发现，杨、张两位专家的评语并非客套话，而是对进才这部著作多方面学术原创性的恰当概括。

我也是这本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最近又重读一过，而重读的

感受更进一步印证了杨、张二先生的赞誉。尤其是进才穷究史料、让史实说话的功夫，不仅让人印象深刻，而且令人肃然起敬。这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在本书第三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进才分别用两条史料，纠正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学术定论，并对一场相持不下的学术论争做了了断。那个被大家深信不疑的定论是，许多西方语汇之进入现代汉语乃是转借于日本的翻译，但进才却以西方传教士马礼逊 1808 年开始编纂、1822 年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为证，说明“不少词汇原本是日本从入华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中借取的汉字新语”。民国时期另一场论争的焦点是圣诗汉译与白话新诗的关系问题，但由于进才发现了 1872 年的圣诗白话诗体译文，这个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像这样以新发掘的原始文献来解决学术是非、揭示问题症结的事例，在本书中所在多有。不难想象，在这些重新披露的大量文献史料背后，进才倾注了多少爬梳的辛劳和发现的慧心。此外，进才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和简净清爽地叙述历史的文风，也特别值得赞赏。我相信，任何一个关心这个课题的同行只要翻阅一下这本厚重的书稿，都会从作者那力戒艰深、力求平易的叙述和分析中，得到这样那样的启发和收获。尤其是当你被那些“语言是存在之家”、“逻各斯中心主义”之类玄奥理论和高深话语搞得晕头转向，苦感到“你不说我还比较清楚，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的时候，本书真如一场清凉宜人的及时雨，它让你穿过那些历史本有的重重迷雾，躲过那些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炙烤，而清晰地洞见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历史实际——它的来龙与去脉、纷争与互动、内在与外加之动力，它在文学范畴内的和超越文学范畴的成就与经验，它的种种理想与实践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目前其实只有本书给予了全面系统而且翔实可靠的叙述和梳理。所以可以断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本书都将是那些想要了解或有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人必备的参考书。

我和进才认识已近十五年了，彼此早已是颇为相契的朋友。所以，对他艰苦曲折的求学经历和从不自满的为学精神，我最为熟悉。进才 1967 年出生于河南汝南县一个乡村，1982 年初中毕业时虽然成绩优异，却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给两个弟弟读书机会，自己便放弃了读高中、上大学的机会，而考入汝南师范学校读书。1985 年师范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汝南师范附小任教，其间自学了大学

英语，并相继获得了河南大学汉语言专业专科、本科自学考试文凭。1993年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进才考入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他深知自己本科基础不够坚实，所以在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同时，还发愤努力去补习了一些没有学过的大学本科课程，到1996年毕业时，他已是同学诸子中的佼佼者，所以被留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99年8月，进才又考入中山大学，师从黄修己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其间为照顾妻子和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而不得不奔波两地，2002年仍以出色的论文圆满完成了博士学业，随即回河南大学任教，成为河南省高等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带头人。1994年以来，进才先后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他的博士论文《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也在2005年出版，并获得学界好评。按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已颇为难得，尤其是博士论文的出版，不论对人对己，进才都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以乘机休息一段了。但进才仍然毫不放松自己，不久，他又抛家别雏到北京做博士后，清苦而且刻苦地“站”了两年。

如果说进才青年时期的投考研究生，是为了圆少年时失落的梦想，并带着改善个人生活处境的意思，那么他后来的博士而又博士后，则是出于对学术的执着——他试图通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 and 大的压力，迫使自己在学术上弥补不足、超越自我。我最为难忘的是，进才曾经多次向我诉说他对自己博士论文的不满，并说他之所以选择“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一个课题作为自己博士后研究课题，也不是自以为在这方面有什么过人的积累和优势，倒恰恰因为它对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足以促使自己早日走出博士论文的“成功”，尽快地超越既有的学术“自我”。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自我批评绝非故作谦虚，更感动于他自我挑战的勇气。一个人不论为学还是为人，其实都无须把别人作为赶超的偶像或打倒的敌人，真正难于超越而又必须不断超越的乃是自己。这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知易行难”，即以为学而论，多少博士的“博士”后学术长期停留在其博士水平上，甚至退回到其博士前的水平。而真正像进才这样不但不自满反而主动向自己挑战的人，委实不多。对现在这本新著，进才同样以缺陷尚多和能力不足为憾，这也是坦诚之言。的确，像这样一个重大而且复杂的课题，谁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完成它，进才此书自然也难免缺

点和不足，有待他今后去改进或拓展。然而，进才已如此清醒地自知其不足，我也就无须在此劳舌了。

那么，就让我们静待“博士后”之后的进才在学术上必定会有更大的自我超越吧。

2007年7月30日于清华园听风庐

刘进才，男，1967年生，河南汝南人。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4年10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被评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带头人。先后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一部。

目 录

序	解志熙 1
---------	-------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现状	3
三、主要内容和预期目标	6
四、方法论思考: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史料问题	8

上编 现代语言运动的发生

第一章 现代语言运动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	13
一、“国语”和“国民”	14
二、普及知识与民族救亡	16
三、“统一国语”与“统一国家”	23

第二章 “汉字不死”,“大祸不止”?	
——晚清以降废除汉字的语言变革思潮	38
一、从“言文一致”到“国语统一”	
——维新思潮激荡的语言变革热情	39
二、“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	
——新世纪派的语言变革主张	47
三、从 Esperanto 到国语罗马字	
——钱玄同废除汉字的语言观念	59
四、汉字:文化霸权抑或符号暴力?	
——从大众语的讨论到拉丁化的提倡	67

第三章 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

- 西方传教士与白话文体的先声 84
- 一、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早期报刊 84
- 二、《圣经》翻译与白话文体 89

中编 语言运动与国文教学

第四章 被发现的风景

- 国语运动与 20 年代儿童文学的兴起 107
- 一、国语运动与国文教学 107
- 二、现代“国民”的塑造
 - 儿童文学进入国语教科书 114
- 三、“鸟语兽言”的论辩 125

第五章 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

- 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
为个案 132
- 一、中学国文程度低落了么? 134
- 二、国文教材:重“美术文体”,还是“应用文体”? 139
- 三、“抢救国文”与文言教学 147
- 四、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152

下编 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建立

第六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腔革命”

- 白话语言欧化的合理性探寻 161
- 一、白话文欧化的必要性及其限度 161
- 二、翻译中的语言欧化问题 180
- 三、新式标点
 - 现代文学的“创格”之举 191

第七章 新文学建构中的民间语言资源

- 以《歌谣》周刊、《国语周刊》为中心 202
- 一、被发现的民间
 - 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共享资源 202
- 二、呼唤一种新的“民族的诗”
 - 歌谣研究与新诗体式 213
- 三、方言调查与国语建设 225
- 四、刘半农的诗学观念与方言诗歌实践 235

第八章 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

- 40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
限度 250
- 一、“方言”，还是“国语”？
 - 方言剧与国语运动 250
- 二、“为工农兵”，还是“为知识分子”？
 - 华南方言文学讨论 259

第九章 思想改造与语言认同

- 《讲话》以后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与
创作实践 267
- 一、“文化下乡”运动与作家语言的“工农兵”化 267
- 二、文本的缝隙
 - 难以协调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 277

第十章 汉语书面语规范的确立与方言、土语的规训

- 语言规划与作家创作的新变 287
- 一、斯大林的语言观念
 - 汉民族统一语建构的理论资源 287
-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语言共同体的形成 291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304

后 记 316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现代语言运动主要指晚清以降的语言文字改革及国语统一运动,是以追求言文一致为目的,使中国汉语书面语言从文言向现代白话转型的语言现代化运动。语言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以国语运动为主体。

应该说,“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较为宏阔的研究题目。就语言运动本身来讲,如果从 1892 年卢懋章创制《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算起,到 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规范化会议的召开及此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现代语言运动走过了六十余年的艰难历程。然而,对于这一纷纭复杂的语言发展史,在语言学领域也只是作为现代汉语史的书写对象,且大多着眼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技术层面的分析和考察。周光庆的《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虽稍微跳离语言技术层面的探讨,但只是侧重探究汉语新词的引进和创造所呈现的思想文化内涵,以汉语新名词个案为中心探寻汉语和中国现代化的关联。如果不是仅仅把语言运动局限在语言学视野中,而是把它置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考察,那么,许多问题就很有必要追问:现代语言运动为何发生?语言运动发生的每一历史阶段需要处理哪些各自的难题?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语言运动自身有哪些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问题,现有的现代汉语历史的相关著述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详实的答案。

强烈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激发不断探究的激情。如果不是仅仅把语言运动视作语言内部的发展与演变史,而是把它放在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时段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思想的剖析,那么,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则会凸显出来。20 世纪语言运动和现代

文学的发生具有天然的同构性，晚清由民族救亡引发的开启民智、普及民众知识的教育思潮必然触动对中国旧有的艰深晦涩的语言文字改革——这正是现代语言运动之所以发生的缘起，具体落实到文学文体上，便是晚清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平易畅达、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作为启迪民众、教育民众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在民族救亡、启迪民众的共同目标下，语言运动在“五四”时期与新文学运动走向合流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其实，就建立汉民族现代书面语来讲，语言运动和现代文学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各自的实现路径不同而已。文字改革者和国语运动家通过编撰国语词典审定国音、吸纳新语、收录新词，大大丰富并改变了原有的语汇，通过制订新的语法体系规范了现代汉语的语法表达，最终实现统一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新文学作家则是通过胡适倡导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路径，借助新文学创作实践以建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前者侧重语言标准的制定，后者更关注文学自身的实践。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国民小学校改“国文”为“国语”，标志着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二者的合流可谓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一合流不但进一步凸显了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密切关联，同时也使中国的语文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动。由原来教授“国文”到“五四”后的改授“国语”，在教育体制内部确立了新文学的合法地位，使国语运动从“书斋里的学问”变成了面向大众的教学实践。需要提及和应该强调的是，新文学最初进入小学教材首先是出于国语的教学实践，正是语文教学连结了一向表面看来似乎“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的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为造就现代新型的国民——所谓新型，除现代性的思想理念外，还包括学习为获得现代理念所必需的现代语言，语文教育自然就首当其冲。事实上，许多语文教育家也往往身兼两职，或者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和研究家，或者是新文学作家，前者如黎锦熙、魏建功、吕叔湘等，后者如胡适、叶圣陶、朱自清等。他们通过编纂中小学语文教材，既贯穿了国语运动的理念，同时也巩固了新文学的成果。中小学语文教学（共和国以前称之为国文教学或国语教学）是国语运动家和新文学作家共享合谋的合法性“实验基地”，也是趋新与守旧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争夺交汇的“文化场域”。通过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纂问题的探讨，不但可以领略语言运动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紧密关

联,探索出现代语言运动如何催发出适合小学语文教学的新型的现代儿童文学文体,也可进一步把摸到现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问题在国文教学中的脉搏。

因此,“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实质上就涵盖了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对语言运动自身发展与演变的思想文化逻辑的考察;二是探寻现代文学在造就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所承担的功能;三是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所呈现出的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考察。事实上,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建立是国语运动家、新文学作家和语文教学三者合力推动的结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对于这方面的探讨又如何呢?

二、研究现状

毫无疑问,语言是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本体论问题。如果说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曾经历过一次引人注目的语言学转向,那么,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同样表现出对文学语言本体的热切关注和持续思考。目前从语言学角度透视现代文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一)中国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探询。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运用“道”、“器”论的语言观念重新审视晚清和“五四”的白话文学运动,以胡适的白话新诗、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个案,重点剖析“五四”文学革命对晚清白话运动的超越以及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郜元宝在《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为什么粗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与现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等文中重点探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工具论与本体论的语言观念,对母语的“陷落”给予警醒。曹尔云的《白话文体与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主要以胡适为个案全面探讨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现代性、传统性及文学问题的诸种关系。

(二)“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语言学反思与批判。张颐武的《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文艺争鸣》1990年第4—6期)、诗人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以及黎湘萍的《语言革命与现代性——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学革命的反思》(《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高旭东的《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批判地反省“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历史局限性。郑敏反思胡适、陈独秀等人所持的白话/文言、口语/书面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对胡、陈二人语言学的理论盲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三) 语言学视野中的作家个案研究。高名凯、姚殿芳等于1957年合著出版的《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发展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在我国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郜元宝的《作为方法的语言——“胡适之体”和“鲁迅风”》(《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曾对胡适、鲁迅的文体进行比较并指出二人对汉语文学语言各自的独特性贡献。李陀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今天》1997年第4期)以汪曾祺为例论及作家写作与现代汉语形成、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专章探讨周作人对“五四”语言变革的独特贡献。韩立群的论著《中国语文革命——现代语文观及其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重点考察了胡适、鲁迅、毛泽东的现代语文观及其文体实践。

(四) 语言变革的断代史研究。《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商务印书馆,1959年)是目前我见到的较为全面考察汉语书面语言变迁的唯一一部著作,该书重点探讨了“五四”以后汉语语法和词汇的发展,但对于文学文体关注不够,而且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对胡适在现代语言变革中的贡献进行了在现在看来并不合适的评价。袁进《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言文一致”和“由俗趋雅”相互交融的语言变革线索。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陈平原《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吴秀明《论当代中国文学语言意识与语言革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等均对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汪晖的《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把方言问题放在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中进行分析,在语言变革的层面研究了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和地方性之间的历史关系。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主要

探讨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国语运动的内在关联。此外，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专节探讨了“五四”时期的语体变革。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这些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呈现的问题意识均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要么侧重从思想史角度探讨语言观念，具有较强的理论预设性；要么只是考察单个作家的语言贡献及文体意识，或者只是探讨现代文学某一时段或某一具体论争，研究视野略显狭小。即使有宏观的研究，但却缺乏对晚清以来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史料的深入发掘，尤其缺乏对现代语言运动和现代文学内在关联具体而微的深刻探寻。

那么，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又如何呢？就我的视野所及，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文教育界，以李杏保、顾黄初和郑国民为代表。李杏保、顾黄初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从清末到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语文教育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其中偶尔涉及语言问题，但主要侧重教材建设、课程改革与教法实践等语文教学研究。郑国民《近代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二三十年代我国初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变革》（《小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4期）、《清末民初教育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1年第7期）等一系列文章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小学语文课程内容改革与文言、白话的选择问题，但这些研究均未把语文教学置于国语运动的脉络中进行考察。钱理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最早关注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的深刻联系，但这一探讨只是着眼于“五四”时期。

因而，把语言运动、现代文学与语文教学三者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整体加以总体性的观照与把握，还是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

本书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语言运动的背景中对现代文学语言问题进行总体观照，探寻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建立过程。在史料运用方面，首先大量收集晚清以来的语言文字运动史料，尤其是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有关史料，同时旁及现代语言文字学家、现代作家关于语言改革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梳理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历史脉络，并考察语言运动对现代文体的具体影响，力图对前